



从历史遗产到地域文化符号： 淮楚文化的精神结构与当代表达

苑萌萌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赓续不绝的实物见证与精神象征，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地区文化延续的重要基础。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历史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中持续发挥作用，是当前地域文化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于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地方而言，文化资源不仅需要被保护和传承，更需要在当代语境中得到重新解读和系统阐释。

近年来，随着武王墩楚墓等重要考古发现的持续推进，淮南楚文化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日益凸显。淮楚文化作为楚文化在淮河流域演化而成的区域性文化形态，其内涵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更在当代语境中逐步实现从“历史遗产”向“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因此，构建“淮楚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符号，不仅是对散存文化资源的系统整合，更是将其置于当代公共文化空间中实现“活态传承”的关键一步。

从历史遗产到文化符号：“淮楚文化”的概念建构

从历史脉络看，淮南地区地处淮河中游，早在战国末期已成为楚文化北迁后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文明格局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老子、庄子等先秦思想家的活动区域与当今淮河流域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思想传统对江淮地区楚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安丰塘（芍陂）、因势利导治理水系的实践，以及战国末期楚国迁都寿春并逐渐形成江淮地区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事实，共同构成了淮南地域厚重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一文化形态并非零散遗存，而是在特定历史地理空间中形成的、具有高度连续性与代表性的文化体系。

从学理层面审视，地域文化是在特定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多种文化现象的综合，而文化符号是地域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凝结而成的意义载体，它超越物质形态，承载着特定群体的精神认同与情感记忆。正因如此，地域文化符号往往能够在不同社会语境中持续唤起人们对特定地域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长期以来，淮南楚文化资源主要以“历史遗产”的形态存在：或作为考古遗存、历史文献进入学术研究视野，或以遗址、文物的形式被保护与展示，其价值更多停留在历史认知与学术阐释层面。这种以“分散呈现、静态认知”为特征的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楚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也限制了在当代社会中的整体传播与现实转化。

正如高旭在《十议“淮楚文化”》中所指出的，淮南地域并非仅拥有零散的楚文化遗存，而是在战国晚楚与西汉淮南国时期形成了具有高度集中性与代表性的楚文化形态，其历史影响力、文化完整性与精神象征意义，在中国楚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若仅从“遗产保护”或“地方史料”的角度加以理解，便难以充分揭示其作为整体文化形态所蕴含的时代价值。

“淮楚文化”概念的提出，正是在这一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对淮南楚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重新命名的一次重要尝试。它不再将楚文化视为若干孤立遗存的简单集合，而是立足淮河流域与江淮区域的整体视野，将寿春都城体系、楚王墓群、水利工程、思想传统及其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加以贯通，从而实现由“历史遗产”向“地域文化符号”的转化。这一转化，不仅赋予淮南楚文化以整体性表达的可能，也为其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参与当代文化建构奠定了概念基础。通过“淮楚文化”这一符号建构，使原本断裂的历史片段得以串联，形成具有叙事性与认同感的文化图

景，从而为其进入当代传播与意义再生产提供了可能。

淮楚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符号表达

从整体上看，淮楚文化并非单一或静态的文化类型，而是楚文化北上中原，在淮河—江淮过渡带这一特殊历史与地理空间中，经过长期演化、整合与重构而形成的复合型精神结构。

首先，淮楚文化延续了楚人“不服周”的独立品格，在楚国后期都城北迁寿春、国势衰微的背景下，进一步淬炼为逆境中的坚忍与使命意识。从“筲路蓝缕”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再到与淮河水患抗争以及与战争频仍的现实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兼具自然抗争与政治抗争的双重韧性。这种筲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抗争意志，是淮楚文化最具“历史张力”的精神底色。

同时，淮楚文化并未因长期处于动荡环境而走向封闭。与此相反的是，地处南北过渡带，使淮楚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开放性与整合性特征，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融汇了中原礼制的秩序性、楚文化的浪漫性与江淮水文化的灵动性；在思想上则呈现出多元整合的特征，《淮南子》正是这种“后百家时代综合”的成果，以道家为主干，兼采儒、法、墨诸家之长。这种文化结构特征，使淮楚文化逐渐形成不分畛域、重功能整合与整体协调的开放心态，展现出兼容并包的文化气度与南北交融的精神胸怀。

从思想转型的角度看，相较于江汉地区楚文化较为突出的巫性与神秘色彩，淮楚文化在北上过程中完成了由浪漫向理性、由神秘向现实的内在转型。以道家思想为底色，同时积极吸纳儒家的伦理秩序、法家的制度意识与墨家的功利理性，而在实践层面重视交通、商贸、水利与技术经验，形成灵活、务实而不保守的文化取向。这种“守其根本而不断创新”的精神形态，体现了淮楚文化守正图新的创新意识与求真务实的实践精神。

在治理思想方面，淮楚文化延续并发展了淮河流域深厚的民本与柔性治理传统，强调统治应“因民而治”“以百姓心为心”；在天人关系上，主张顺应自然、平衡调适，体现早期生态智慧。这种民本关怀与自然观念，使淮楚文化既不同于法家强调强制秩序的政治模式，也区别于纯粹儒家礼治的规范路径，呈现出以柔克刚、以和致治的独特精神取向。

同时，淮楚文化也保存了楚文化最核心的情感能量，并使之与汉代理性精神相调和；审美上，形成“狂放而不失度、浪漫而不虚浮”的楚风汉韵；塑造了以屈原精神为核心的爱国、忠义、忧民传统；在民俗与记忆中，通过仪式与习俗维系“念祖怀乡”的文化认同。这种狂放达观而又九死未悔的精神品格，构成淮楚文化最具感染力与传播力的情感内涵。

此外，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楚人尚义传统与儒家德治思想之间，形成稳定的道德共识：重承诺、守信用，强调人格与政治信誉；推崇为政以德、任人唯贤、清正廉洁；将道德修养视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基础。以上皆是在政治运作与社会交往中反复被确认的行为准则。这种伦理取向最终沉淀为强调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与厚德载物的道德追求。

淮楚文化的精神建构，本质上是一次从历史深处走向符号现实的文化实践。它提示我们，地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保护与展示，更应通过符号提炼、叙事重构与意义激活，转化为当代人可感知、可认同、可传播的精神符号和具有时代活力的地域文化符号。唯有如此，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实现“活起来”，并在文旅融合、地方认同与文化创新中持续发挥其现实生命力。